



卓越学术文库

城镇化道路调整

——基于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的视角

CHENGZHENHUA DAOLU TIAOZHENG JIYU CHANYE ZHUANYI YU LAODONGLI LIUDONG DE SHIJIAO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郭 力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卓越学术文库

城镇化道路调整

——基于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的视角

CHENGZHENHUA DAOLU TIAOZHENG JIYU CHANYE ZHUANYI YU LAODONGLI LIUDONG DE SHIJIAO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郭力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镇化道路调整:基于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的视角/郭力著.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2016.9

(卓越学术文库)

ISBN 978-7-5645-2589-7

I. ①城… II. ①郭… III. ①城市化-研究-中国
IV. ①F29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1192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新乡市豫北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14

字数:267 千字

版次:2016 年 9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电话:0371-66966070

印次: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2589-7

定价: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一、研究背景	1
二、研究意义	3
第二节 基本理论与国内外研究综述	5
一、城镇化	5
二、城镇化道路	11
三、劳动力流动与回流	17
四、产业转移	23
五、劳动力、产业与城镇化的关系	26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技术路线与创新点	28
一、主要内容与结构框架	28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29
三、创新点	31
第二章 中国城镇化道路演变特征与问题	32
第一节 产业与劳动力视角下的中国城镇化道路及其历史演变 ...	32
一、20 世纪 80 年代: 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与小城镇发展 模式	32
二、20 世纪 90 年代: 产业集聚、“两栖式东南流”与集中型 城镇化	35
三、2004 年至今: 产业内迁、“劳动力回流”与城市体系均衡 发展	39
四、未来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趋势的预判	45

第五节 当前我国城镇化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48
一、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城镇化效率低下	49
二、人口城镇化滞后与“半市民化”	51
三、城市规模结构失衡	53
四、城市空间布局与功能划分不合理	55
第三章 城镇化道路转变的契机: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	58
第一节 劳动力流动的特征与动因	58
一、流动劳动力的数量与结构特征	58
二、“用工荒”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不确定性	62
三、劳动力回流的宏观动因与影响效应	64
四、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微观特征——基于农民工调研数据的实证	70
第二节 产业转移的特征与动因	77
一、产业转移的宏观动因	77
二、产业转移所面临的国际竞争	82
三、产业转移的典型案例分析	83
第三节 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的互动关系机制	92
一、劳动力流动“替代”产业转移:区域非均衡发展	93
二、劳动力短缺与回流“倒逼”产业转移:区域均衡发展	95
三、劳动力回流“倒逼”产业内迁的原因——聚集力与分散力的非匹配性	96
四、劳动力回流与产业内迁的正向循环累积因果效应	98
第四章 基于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的城镇化道路演变机制	100
第一节 劳动力与资本(产业)流动对城镇化道路演变的影响效应	100
一、模型的假设前提	100
二、模型构建	102
三、劳动力与资本(产业)流动对城市产出的影响效应	103
四、不同城镇化阶段下的影响效应差异	104
五、运输成本对城市结构体系演变的影响	107
第二节 城镇化道路演变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及其政策启示	108
一、城市体系演变模式对现实的解释及对策启示	108
二、技术条件扭曲对城市产出的影响机制及其现实启示	110
一、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内涵及构成因素	111

二、模型构建与估计	113
三、实证分析	115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116
第五章 基于产业内迁与劳动力回流的城镇化道路转变	
路径	118
第一节 城镇化的动力优化:由投资驱动到人力资本支撑	118
一、劳动力短缺与回流凸显人力资本对城镇化的驱动效应 ...	118
二、城镇化中后期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求重视人力资本培育 ...	119
三、就业导向下的人力资本驱动型城镇化及其梯度格局	121
四、人力资本优势弱化与现行生育政策的渐进式调整	124
第二节 城镇化的质量提升:由农民工“两栖式迁移”到“市民化”	
融入	125
一、“市民化”转变的背景与本质内容	126
二、城市布局过度集中导致大城市的“市民化”成本高企	129
三、产业内迁、劳动力回流与“市民化”重心下移	131
四、“市民化”的对策建议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133
第三节 城镇化发展重点的转变:由大城市到中型城市	142
一、城镇化收益与城市规模的关系——来自中国城市数据的验证	143
二、我国大城市规模过度的原因	145
三、小城镇无法成为城镇化发展重点	150
四、基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最优城市规模选择	151
第四节 城镇化的空间布局调整:由集中到分散的城市群	154
一、代表性国家的城镇化道路及借鉴	154
二、分散型城镇化道路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160
三、城市群与郊区化发展趋势	165
四、郊区化进程中的“职住分离”问题——基于郑州市的实证	168
第六章 城镇化道路的战略选择与对策建议	177
第一节 城镇化战略选择	177
一、市场主导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城镇化道路	177
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179
三、坚持走人本城镇化道路	180
第二节 以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镇化道路优化	182

一、依托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城镇化质量提升	182
二、加快承接产业内迁与主导产业选择	183
三、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避免城镇化虚假繁荣	185
第三节 构建人力资本驱动型城镇化	186
一、以人力资本培育应对“产业空心化”挑战	186
二、以人本理念加速劳动力回流与内陆城镇化进程	187
三、以人力资本培育推进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188
第四节 城镇化发展重点选择	196
一、城镇化发展重点的具体选择及其区域差异	196
二、引导城镇化发展重点下移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体制	197
第五节 促进城市体系分散化	198
一、多中心城市群发展模式	198
二、大都市区的郊区化与卫星城建设	200
三、郊区化中“职住分离”问题的原因与解决对策	202
参考资料	206
后记	215

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与驱动力。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全球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 1800 年的 5.1% 上升到了 2005 年的 48%。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城镇化进程主要集中在英、美等发达国家;战后,城镇化开始形成世界性趋势与规模,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成为城镇化发展的主体。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 2000 年就指出,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将是深刻影响 21 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主题。^①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持续加速,1998 ~ 2008 年城镇化率年均提升达 1.2%。^②截至 2011 年年末,我国城镇化率为 51.27%,在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由于以全球为基础的工业化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在中国已接近尾声,通过加快城镇化和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③“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指出,城镇化的顺利推进是关系我国未来 10 ~ 20 年发展大局的关键,也是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

① 盛广耀:《城市化模式及其转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 页。

② 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10 年第 10 期。

③ 陈昌兵、张平、刘霞辉等:《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9 年第 10 期。



社会转变的必然趋势。

虽然快速的城镇化愈发成为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与关键枢纽,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当前中国城镇化急剧发展过程也集中体现了成长中的种种矛盾与问题,如人口拥挤、土地紧缺、环境恶化、住宅价格高涨、公共服务不足、交通基础设施不堪重负等。^①总体来说,我国传统城镇化道路中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性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人口城镇化长期滞后于经济工业化,并且大量进城农民工无法平等地享有城市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实际上是处于“伪城镇化”或“半市民化”状态;第二,政府主导、投资驱动的传统城镇化动力机制造成生产要素配置扭曲、资源消耗过度、经济增长效率低下及环境承载力不堪重负;第三,城市梯度差异悬殊,少数大城市急剧膨胀引发各种严重“城市病”,而大量中小城市发展乏力,进一步加剧区域经济差距;第四,向心集中的城市布局及演变特征导致城镇化的拥挤效应提前显现,各级城市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及排斥性竞争突出,而产业职能与城市功能的分工合作体系没有很好形成。

从实践上看,上述各种“城市问题”的根源主要应归结于我国产业与劳动力的空间布局与流动方向存在偏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率先主要在东部发达地区及大城市形成集聚,进而引导劳动力大规模“两栖式东南流”,形成对本应发生的产业内迁的“替代”。这直接导致我国城镇化布局过度集中、区域经济结构失衡、城市级别差异拉大、驱动力扭曲以及公共服务成本过高与“市民化”困难,进而诱发房价攀升、交通拥挤、生态环境恶化等严重“城市病”。从理论上来说,产业与劳动力的分布、集聚及动态调整不仅是影响城市发展与城市体系演变的核心因素,也是我们进一步调整、优化城镇化道路的重要依据与出发点。“解铃尚需系铃人”,要解决当前城镇化发展中诸多问题,仍要着眼于对当前及未来产业与劳动力动态演变趋势的理解、预判与适应。只有抓住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中的有利现实环境契机,积极转变城镇化发展道路,才能实现快速城镇化引导下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当前及未来若干年,对我国城镇化发展影响最直接、改革契机效应最明显的重大形势转变即产业内迁与劳动力短缺、回流态势。

首先,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大批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往中西部梯度转移及布局调整,极大地带动了中西部省份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

其次,2004年前后,“民工荒”现象在我国初现,“刘易斯转折”特征及劳

^① 张鸿雁:《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社会学视角的理想类型建构》,《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动力短缺趋势愈发明显,劳动力要素与人力资本质量越来越成为主导城镇化的决定性因素。

最后,作为我国流动劳动力的主体,多达 2.5 亿的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倾向于“回流”到中西部家乡附近就业,并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表现出主动化、长期化与规模化“回流”特征,引领新一轮产业内迁与“本地城镇化”浪潮。产业内迁与劳动力短缺、回流不仅深刻反映了现有生产要素布局与区域人口、资源与环境约束的矛盾,也预示着我国将由区域经济结构趋异转向趋同化态势,最终必将对我国城镇化发展演变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成为我们探究城镇化道路转变的重要出发点与立足点。

在理论上,新经济地理学认为资本、劳动等要素流动及其对比关系决定了城市产出增长机制与城镇化体系演变。那么,基于不同的城镇化效应与条件假设,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机制与影响效应差异?在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阶段,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会使得城市产出与城镇化体系如何演变?具体来看,近年来产业内迁与劳动力回流、短缺趋势又会怎样推进城市体系均衡化与发展路径优化?本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厘清产业转移、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关系机制,有效地解释、预测我国城镇化发展现实与未来,而且能够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与要素流动条件,设定城镇化发展的最优路径及相关政策保障。

在实践中,当前及未来若干年我国城镇化道路的转变必须立足于产业内迁与劳动力短缺、回流趋势。只有抓住这些有利的外部条件契机,才能提高城镇化发展效率,实现快速城镇化引导下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面对传统城镇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矛盾,根据城镇化动力机制的阶段差异,本书重点实证分析怎样基于当前产业内迁与劳动力短缺、回流契机,调整、优化我国城镇化的内涵质量、驱动机制、发展重点与空间布局;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为我国城镇化发展实践提供思路借鉴与可行性政策建议,促进我国产业、劳动力的合理布局及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意义

城镇化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与枢纽,而且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经过程与重要标志。加快推进城镇化对我国当前及未来若干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只有依托持续推进城镇化进程,才能有效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以应对金融危机与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外需衰退风险;才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升产业竞争力与农业现代化水平;才能解决农民工的就业与民生难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但是城镇化发展中的质量内涵缺



陷、驱动机制低效、区域布局矛盾,以及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等问题也逐渐凸显。面对这些严峻形势,当前学术界对我国城镇化问题的实证研究及相关成果相对不足,尤其缺乏联系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的城镇化道路研究。在理论关系上,产业与劳动力的流动、集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与核心内容,而城镇化反过来也是产业与劳动力流动的载体与结果。本书围绕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视角研究城镇化问题,对于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当前关于产业转移、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多集中在三次产业结构与劳动力流动关系、劳动力流动对城镇化的影响、产业转移与城镇化互动等局部关系效应领域,鲜有综合三者互动关系的时空演变分析,因此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及政策可行性。本书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基础上构建了要素流动对城镇化发展演变的影响效应模型,经过系统的理论分析得出:基于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阶段与集聚效应、规模报酬假设,资本要素流动(产业转移)与劳动要素流动的互动关系决定了城市区域产出增长机制与城镇化的空间演变格局。这不仅厘清了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城镇化发展演变的作用机制,而且有效解释了劳动力由“东南流”到“回流”、产业由东部集聚到内迁、城镇化由向心集中到离心分散的现实历史演变,最终为要素高效配置及城镇化道路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及思路启示,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

其次,本书重点基于产业内迁与劳动力短缺、回流趋势背景研究城镇化道路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城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产业与劳动力在空间聚集与流动的伴生现象。当前产业内迁及劳动力短缺、回流不仅深刻影响着我国城镇化的重大变革,而且也为解决城镇化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本书基于这一现实机遇背景,重点论证了低成本、重心下移的“本地市民化”融入方式,劳动力主导、人力资本驱动的城镇化动力机制,以中型城市为重点的城镇化模式及其最优规模选择,离心分散、职能梯度分化的城市群发展战略等关键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具体可行途径,具有一定的实践创新意义。

最后,由于中国区域之间的要素禀赋状况与城镇化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性,基于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的城镇化道路也应当具备区域特色。而当前的城镇化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缺乏关注东部与中西部的差别与对比,因此针对性、实践性不强。本书以区域协调发展及就业增进为目标,基于当前产业内迁与劳动力回流趋势,系统构建体现区域产业、职能分工与城市梯度格局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及具体对策建议,对于实现新型城镇化引领的“三化”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基本理论与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城镇化

(一) 城镇化的概念界定

1867年,西班牙人 A. Serda 首先提出了“城镇化”(urbanization)的概念。在经济学意义上,城镇化大体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人口层面的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二是产业层面的农业生产活动向工业化、非农化转变的过程;三是空间层面的城市区域不断向农村区域扩张的过程。另外,一些学者从社会学角度提出,城镇化内涵的关键是人们生产、生活、居住方式的变更。例如,芝加哥学派的 Louis Wirth 强调,城镇化是一种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城市文化和价值观的扩散过程。^①

英文中的 urbanization 在国内有“城镇化”“建制镇”两种翻译方式,学者们对于采取哪种表述方式尚存在分歧。和国外镇(town)的规模较小或根本没有镇的建制不同,由于我国镇的人口相对较多,并在统计与规划中把“建制镇”也纳入城市的概念范畴,因此在大多数文献中,这两种说法的内涵都是一致的,没有本质区别。不同的是,主张采取“城镇化”的观点更强调将农民转移到小城镇。考虑到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为基本特征,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城镇化”的提法更能反映 urbanization 的本质含义,更符合当前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地理分布广泛、迁移诉求多样的现实背景,故本书采用“城镇化”的表述方式。

按照人口规模,可将城市划分为大、中、小城市。传统上,我国大、中、小城市的人数划分标准为 50 万以上、20 万~50 万、20 万以下。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近年来城市扩张速度较快,并且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已由市辖区非农人口变为市辖区总人口,因此原有的划分标准较低,已不太适用。本书借鉴王小鲁的相关研究结论,将超大城市界定为 400 万人口以上,大城市为 100 万~400 万人口,中等城市为 50 万~100 万人口,小城市为 50 万人口以下。^②

^① Southall, The City in Time and Spa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3 ~ 26.

^② 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分析》,《经济研究》2010 年第 10 期。





(二) 集聚效应、分散效应与城镇化

城镇化之所以重要,理论上的原因主要在于集聚效应。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受产业与劳动力空间流动状况影响的集聚效应与分散效应对于城镇化起着支配性作用。集聚效应主要来源于要素空间集中带来的“本地市场效应”与“生活成本效应”。“本地市场效应”是指企业在特定空间范围内集中布局带来的一些节约成本的好处,例如销售市场与熟练劳动力市场的集中与扩大、要素使用成本与物流成本降低、上下游产业链完善等。^{①②}“生活成本效应”是指劳动者集中在城市区域生活可以满足多样化偏好,并节约运输费用,降低生活成本,易于就业转换。另有学者认为,在当前信息化时代,集聚效应还应包括知识外溢、信息共享等厂商层面的“外部规模经济效益”。^③

根据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集聚效应具有自我增强的特性(图 1-1)。^④ 假设某种外部条件使得人口拥向特定中心城市工作及居住,在“本地市场效应”作用下,流入地的市场规模扩大使得其对企业的吸引力增强,同时新经济地理学的规模报酬递增假设保证了企业集中生产的效益。中心城市的产业集聚与规模扩张进一步发挥“生活成本效应”的作用,使得消费者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与多样化偏好得到满足,进一步驱使人口流向中心城市,最终形成集聚效应自我增强的循环因果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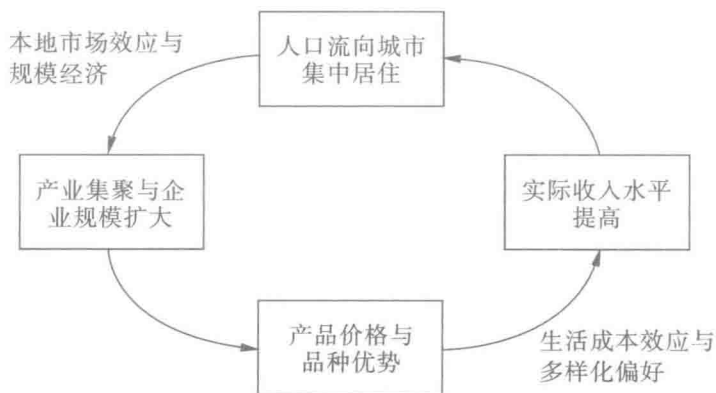


图 1-1 集聚效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

① “本地市场效应”与区域经济理论中所谓“地方专业化效应”与“城镇化效应”的含义基本等同。

②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89～93 页。

③ 陈良文、杨开忠：《集聚与分散：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外部规模经济效益的整合研究》，《经济学（季刊）》2007 年第 1 期。

④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339～345 页。



可以看出,集聚效应及其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发生需要至少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产品差异化使得企业在较小空间集中分布而不会过度竞争,同时消费者能够满足多样化偏好;二是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递增使得企业集中变得有意义;三是存在运输成本,但是这种成本不能高到影响核心区为边缘区提供产品与服务。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框架下的规模报酬递增与垄断竞争市场假设能够满足正反馈机制的前两个微观基础,而所谓“冰山运输成本”假设也为最后一个条件提供了解决途径。

但是,要素在既定城市空间的过度聚集也会造成分散效应。早期的研究中,佩鲁(F. 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赫尔希曼(A. O. Hirschman)的渗透与极化效应理论、缪尔达尔(G. Myrdal)的扩散与回流效应理论都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论述了要素分布扩散化与区域经济均衡化的演变机制。^① 传统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仅仅从本地企业之间相互竞争过于激烈造成的所谓“市场拥挤效应”^②来解释这一分散力,而忽视了城市内部因素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攀升、城市生活质量下降、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不足等因素的重要影响,引起近年来众多学者的拓展性研究。Tabuchi 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框架中加入了城市交通及住宅市场,认为城市内部的通勤成本及住宅消费是造成经济活动集聚度降低的重要分散力。Anas 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纳入分析框架,认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最优城市规模即要素效率最大化的聚集程度会持续降低,最终导致经济活动的分散化。

与集聚效应的自我强化类似,分散效应也具有方向相反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例如,人口(劳动力)的分散化流动趋势会使得图 1-1 中“本地市场效应”与“生活成本效应”发生相反的作用效果,驱动产业转移并与劳动力流动形成循环作用。假设经济开始处于平衡状态,任何外部条件的冲击都会使得要素集聚或分散效果产生循环增强,即使初始条件消失,这一过程也不会自发回到均衡状态,而是强化了非均衡状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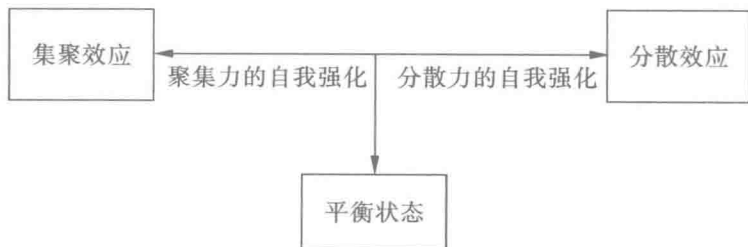


图 1-2 集聚效应与分散效应的自我强化机制

①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95~204 页。

② “市场拥挤效应”也被称为“本地竞争效应”。



(三) 城镇化发展的诺瑟姆曲线规律

1975 年,美国地理学家 Northam 根据世界各国的城镇化发展进程提出了著名的诺瑟姆曲线规律(图 1-3),即城镇化进展一般会经历“起步—加速—成熟”三个阶段,表现为著名的生长理论曲线(Logistic 曲线)^①。在城镇化率低于 30% 的初期起步阶段,由于工业生产力及就业机会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较为缓慢,城镇化表现为低速发展。当城镇化发展到 30% ~ 70% 的中期阶段时,由于工业化加快、经济起飞及城市就业机会增多,城镇化进程会明显加速,城镇化率一般会先以递增速度上升,然后再以递减速度上升。当城镇化率超过 70% 以后,城镇化增速会慢慢降下来,进入质量提升、结构调整的成熟阶段,例如劳动力会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城市功能与社会服务逐渐完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城市体系由集中转向分散,城市群及郊区化趋势显现等。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基本符合诺瑟姆曲线规律:从时间序列数据来看,1995 年左右是我国由城镇化起步阶段进入持续加速阶段的转折点,城镇化率年均增幅从 1981 ~ 1995 年的 0.7% 显著上升到 1996 ~ 2005 年的 1.4%;从区域截面数据来看,近年来城镇化率提升最快的是 30% ~ 50% 的中度城镇化地区,主要集中在中部省份;而作为两个极端,高度城镇化的东部地区和低度城镇化的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提升相对缓慢。^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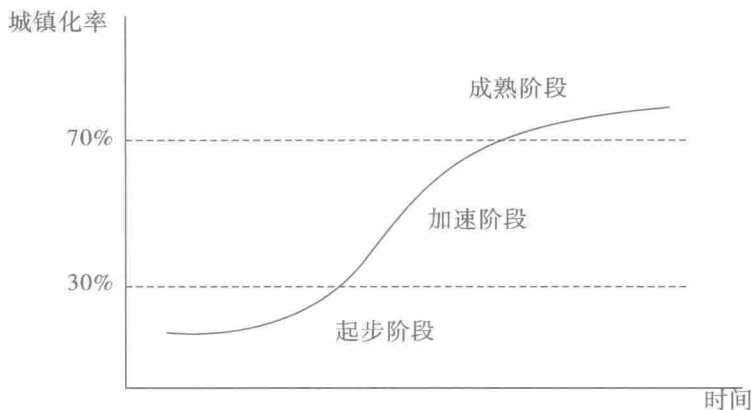


图 1-3 城镇化发展的诺瑟姆曲线规律

① Ray M. Northam, Urban Geography, John Wiley&Sons, 1975。

②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年版。



(四) 城镇化、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许多学者都认为,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刺激内需和转变结构的枢纽,也是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① 对于国际数据和国内数据的实证研究都得出:城镇化水平与人均 GDP 之间存在较强的正向对数关系。^{②③} 城市规模与人均收入的关系也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城市经济学经典理论认为,一个城市的人均收入与城市规模呈倒 U 形关系:随着城市规模的上升,一开始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发挥主导,人均收入会上升;但是到达顶端之后拥挤效应会凸显,使得人均收入开始下降。^④ 克拉克(C. Clark)和西什(W. Z. Hirsch)的研究证实了这点: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均成本先是下降,然后上升,也就是说呈 U 形状态。^⑤

那么,什么样的城市规模在经济上是最佳的呢?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理论上一个城市的最优规模应当考虑成本与收益两方面内容,一般条件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但是城镇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在实践中几乎是不可能取得一致结论的,因为城市中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产业与要素禀赋结构以及社会成本和收益值会不断发生变化。现有的最优城市规模分析多是限定在某一局部领域,不能得出普适结论。但是一个基本共识是,最优城市规模通常在有较大居民数量的条件下才会实现,而这一数量具有上限约束。

(五) 城镇化与环境质量的关系

随着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环境污染、资源约束问题日益严重,城镇化发展道路的可持续性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绿色城市、环境友好型城市、生态宜居城市、低碳城市等概念层出不穷。这方面的研究当前主要集中在城市粗放发展的原因^⑥、国内外先进城市经验借鉴^⑦、集约型城镇化的理论必要

① 陈昌兵、张平、刘霞辉等:《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9 年第 10 期。

② Henderson, Growth of China's Medium-Size Cities, Brookings-Wharton Papers on Urban Affairs, 2005, No. 1, pp. 263-308.

③ 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442 页。

④ Duranton G., D. Puga, Nursery cities: Urban diversity, process innovation, and the life cycle of produ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No. 91, pp. 1454 ~ 1477.

⑤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99 页。

⑥ 任太增、李敏:《中国粗放型城市化道路原因探析》,《现代城市研究》2006 年第 3 期。

⑦ 仇保兴:《借鉴国外经验走资源节约型的城镇化发展道路》,《住宅科技》2005 年第 3 期。



性、总体原则与具体对策^①等方面。研究结论大都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中必须更加注重资源节约与环境改善。

事实上,城镇化和环境质量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Grossman, Krueger 发现,SO₂和烟尘两种污染物与人均收入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形关系,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②。马磊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规律在中国的适用性:1995~2005 年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带来工业污染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形关系,并认为原因在于治理工业污染的部门也存在知识外溢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污染物的集中最终仍有利于城市环境质量改善。^③但是众多学者指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是一个自发过程,必须在城镇化发展中注意产业结构调整、环境法规保护、消费习惯改变、节能减排技术推广以及治污产业规模化发展等对生态环境改善的积极作用。^{④⑤}

(六) 人本城镇化及其多维评价体系

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人本”城镇化,即强调城镇化是为了人、依靠人,成果由全体城乡居民共享。然而,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建设出现明显的“以物代人”倾向,“大拆大建”“规模扩张”“GDP 增长”取代了新型城镇化应有的“人本”理念,最终导致各地普遍出现交通拥挤、生态环境恶化、公共服务不足、收入差距过大等“城市病”。在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城镇化回归“人本主义”内核,并着重从多维系统论角度研究构建人本城镇化的评价体系,以指导新型城镇化建设向集约化、包容性转型。

国外对人本城镇化的研究开展较早,例如芝加哥学派的 Wirth 强调城镇化本质是人们生产、生活、居住方式向城市文明和价值观的转变过程。^⑥近年来,国外人本城镇化研究集中于生态多样化、文化包容、社会安全、人的幸

① 蒋国平:《资源节约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探析》,《改革与战略》2006 年第 8 期。

② Grossman, Krueger,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4.

③ 马磊:《中国城市化与环境质量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0 年第 2 期。

④ Dinda, Soumyananda,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A Survey,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4, No. 49, pp. 431~455.

⑤ Grossman,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1991, No. 7, p. 3914.

⑥ Wirth, Louis,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8, No.44, pp. 1~24.